

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

“博科圣地”的演变与尼日利亚反恐政策评析^{*}

李文刚

摘要：近年来，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世界多地呈现蔓延态势，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各国安全构成威胁。在西非地区，集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于一身的“博科圣地”，对尼日利亚及其邻国的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兴起和蔓延与伊斯兰主义在西非地区的历史积淀和现代勃兴密切相关。尼日利亚民生问题积重难返、国家治理薄弱和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渗透等因素，催化了“博科圣地”的异变。布哈里总统上任以来，尼日利亚应对“博科圣地”问题的举措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改善北部落后与贫困、降低青年失业率、加强地区和国际反恐合作等方面仍任重道远。

关键词：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宗教极端主义；穆哈马杜·布哈里

作者简介：李文刚，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7）。

文章编号：1673-5161(2018)04-0059-15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16ZDA096)的阶段性成果。

伊斯兰教是尼日利亚三大宗教^①之一,传入历史比基督教悠久,对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等领域影响深远。尼日利亚是伊斯兰合作组织(原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国内穆斯林人数占总人口的 50%,超过埃及穆斯林的总数。^②尼日利亚与中东地区关系密切,除每年有大量穆斯林赴麦加朝觐外,1971 年尼日利亚加入“欧佩克”后利用石油武器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与此同时,教派冲突、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问题在尼日利亚日益突出,并与中东地区的同类问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的兴起、异变、坐大、衰退和反弹,深受尼日利亚伊斯兰主义发展、国家治理薄弱和国际恐怖主义渗透等因素的影响。“博科圣地”问题的国际化趋势以及尼日利亚内部民族宗教问题的交互影响,决定了打击“博科圣地”需要综合施策。

一、尼日利亚伊斯兰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

“博科圣地”并非尼日利亚境内出现的第一个伊斯兰主义组织,但如今却异变成成为尼日利亚迄今危害最大、影响最广、国际性最强的一个恐怖组织。“博科圣地”的兴起及其极端化历程,同尼日利亚历史上伊斯兰教的发展,特别是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及尼日利亚北部宗教认同关系密切。

(一) 尼日利亚北部伊斯兰主义的历史根源

公元 11 世纪后半叶,伊斯兰教传到加涅姆—博尔帝国(今尼日利亚北部一带),14~15 世纪传至豪萨城邦。起初,伊斯兰教只是宫廷和商界的宗教,通过穆斯林教师和商人和平地,在尼日利亚北部传播。至 17 世纪,伊斯兰教在尼日利亚北部许多城市广泛传播。18 世纪后半叶,西非地区兴起了以“净化伊斯兰教”为主要内容的“圣战”运动,领导者是富拉尼伊斯兰学者奥斯曼·丹·福迪奥(1754~1817 年)。

丹·福迪奥出生于戈比尔,幼年即学习《古兰经》,师从 18 世纪著名的柏柏尔学者乌玛尔学习伊斯兰教逊尼派教义,后研习苏非主义,成为卡迪里教团的首位领袖。丹·福迪奥游历豪萨城邦传播伊斯兰教,逐渐成为受人尊敬的穆斯林学者。戈比尔国王雍发上台后,同丹·福迪奥和富拉尼人的关系逐渐恶化。丹·福迪奥及其追随者被迫逃亡,于 1804 年对豪萨国王发动“圣战”。该事件成为伊斯兰政治力量登上

^① 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传统宗教是尼日利亚的三大宗教。

^② 尼日利亚总人口达 1.9 亿,其中穆斯林数量达 9500 万,人口占比 50%;埃及总人口达 1.045 亿,其中穆斯林数量达 8,778 万,人口占比 84%。数据来源:《尼日利亚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网站,2008 年 2 月 26 日, 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8356/1206x0_678358/, 登录时间:2018 年 6 月 10 日;《埃及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网站,2008 年 2 月 15 日, 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7342/1206x0_677344/, 登录时间:2018 年 6 月 10 日。

尼日利亚历史舞台的重要标志。豪萨国王倒台后,索科托哈里发国(1809~1903年)随之建立。然而富拉尼人征服豪萨城邦后,却接受了豪萨人的语言和文化习俗,两个民族相互通婚,逐渐融合成尼日利亚的第一大民族豪萨—富拉尼族。在整个19世纪,索科托哈里发国的战士不断向东、西和南部发动“圣战”,开疆扩土,传播伊斯兰教。一方面,伊斯兰教成为维系索科托哈里发国不同民族的纽带;另一方面,“圣战”所宣扬的穆斯林皆平等的理念并没有实现,特别是那些皈依伊斯兰教的小民族,地位明显低于富拉尼人。在向外围发动“圣战”期间,富拉尼人的统帅甚至会拒绝一些民族皈依伊斯兰教,以此获得奴隶来进行城市扩建和维护哈里发国的繁荣。^① 这种状况导致大量弱小民族向哈里发国的南缘,即中部地带逃亡,不少人最终皈依了基督教。中部地带也因此成为北部伊斯兰文化与南部基督教文化的分界线和缓冲区。

索科托哈里发国是当时西非最大的国家,伊斯兰教逐渐成为尼日利亚北部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丹·福迪奥也被认为是尼日利亚伊斯兰教的奠基人,其“圣战”思想和创建哈里发国的实践,甚至成为某些宗教极端组织意识形态和建国合法性的来源。马里的“西非统一与圣战运动”推崇的是丹·福迪奥的思想而非现代伊斯兰主义;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在2011年的一份公开信中质问卡诺州州长:“努力恢复丹·福迪奥昔日的荣光,何罪之有?”^② 丹·福迪奥的“圣战”思想及索科托哈里发国的历史影响,构成了尼日利亚北部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意识形态根基,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又得到人为强化,成为民族国家构建的一大障碍。

(二) 英国“间接统治”强化北部伊斯兰认同

英国殖民统治者在征服尼日利亚南部时并没有遇到多大阻力,但在北部受到了索科托哈里发国的顽强抵抗,感受到了伊斯兰政治力量的抗争。鉴于索科托哈里发国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家机器,为降低殖民成本和弥补人手不足,卢嘉德勋爵建立了“间接统治”制度,选择与富拉尼埃米尔合作,对哈里发国进行改造,以服务殖民当局的利益。在殖民统治时期,北部局势相对稳定,为安抚埃米尔,殖民当局有意识地打压基督教传教士在北部的传教活动,将传教士的活动范围限定在特定区域,这为伊斯兰教在当地的传播提供了空间。但是,“间接统治”使得北部地区继续处于封闭保守的境地,与接受社会变迁的南部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这在教育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历史将尼日利亚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交给了南方人,特别是受西式教育、信奉基督教的伊博人手里。

当北部穆斯林贵族意识到这一点时,甚至以北部尚未做好独立准备为由,试图延缓尼日利亚的独立进程。有学者指出,历史上并没有统一的尼日利亚民族主义,

^① Virginia Comolli, *Boko Haram: Nigeria's Islamist Insurgency*,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5, p. 16.

^② Ibid., pp. 13-14.

而是存在三种民族主义,即北部豪萨—富拉尼民族主义、南部约鲁巴民族主义和伊博民族主义。^①尼日利亚独立运动就是在这三种力量的角逐和妥协中完成的。自独立伊始,北方穆斯林统治阶层就担心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威胁,南部基督徒则担心幅员辽阔的北方会使整个国家走向伊斯兰化,这两种心态成为尼日利亚独立后民族宗教冲突的根源。

(三) 伊斯兰主义加速蔓延

尼日利亚独立后不久,国内便爆发了数起政变和一场内战,南北民族宗教矛盾的激化是造成内乱的重要原因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末,尼国内宗教冲突逐渐加剧,伊斯兰教内部冲突、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冲突、国家教俗矛盾的激化此起彼伏。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下,要求在尼日利亚全国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呼声进一步加重了整个国家的紧张情绪,民众对爆发宗教战争的担忧与日俱增。与此同时,来自利比亚、巴基斯坦、沙特、苏丹的穆斯林宣教者不断涌入尼日利亚,^②外部宗教力量的影响不断上升。1977 年,立宪会议就在联邦层面设立伊斯兰教法上诉法庭进行激烈辩论。类似的一幕在 1988 年的立宪会议上再次出现,虽被总统巴班吉达紧急叫停,但此后要求在尼日利亚恢复伊斯兰教法的呼声从未停止过。

1999 年,北部赞法拉州新任州长萨尼提出效仿沙特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赞法拉州成为首个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州。至 2001 年,尼日利亚 36 个州中北部的 12 个州不同程度地实行了伊斯兰教法,并设立了州一级的伊斯兰教法法庭。^③这些州还纷纷立法,禁绝赌博、酗酒和卖淫等违反伊斯兰教教义的不端行为;设立专门的征税机构和负责执行伊斯兰教法的民兵卫队;设立州伊斯兰教法委员会和乌里玛(宗教学者)理事会;卡诺州和赞法拉州还设立了公共投诉与反腐委员会。此后,因伊斯兰教法问题引发的冲突不断。北部诸州恢复伊斯兰教法的实践,表明伊斯兰主义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影响已上升至制度层面;与此同时,实行伊斯兰教法引发的南北民族宗教冲突进一步加深了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难度。其一,它对国家世俗的政治制度提出挑战;其二,北部穆斯林宗教认同加深,刺激了南部基督徒的宗教认同,对尼日利亚的国家认同构成挑战;其三,伊斯兰教法的实行对伊斯兰主义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发展起到了示范效应。正是在此背景下,“博科圣地”逐渐兴起、发展和发生异变。

^① Ali A. Mazrui and Michael Tidy, *Nationalism and New States i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1984, p. 92.

^② Virginia Comolli, *Boko Haram: Nigeria's Islamist Insurgency*, p. 20.

^③ Ahmed Murtada, "Nigeria: Its Beginnings, Principles and Activities in Nigeria," *Salafi Manhaj*, 2013, p. 5, http://download.salafimanhaj.com/pdf/SalafiManhaj_BokoHaram.pdf, 登录时间:2018 年 3 月 9 日;参见 Rasheed Oyewole Olaniyi, "Hisbah and Sharia Law Enforcement in Metropolitan Kano," *Africa Today*, Vol. 57, No. 4, Summer 2011, pp. 71-96.

二、从伊斯兰主义组织向恐怖组织的异变

“博科圣地”系豪萨语和阿拉伯语的组合词,意为“禁止西方教育”^①,正式名称为“致力宣教与圣战的遵训者组织”,最初系2002年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首府迈杜古里兴起的一个伊斯兰主义组织。该组织创始人穆罕默德·优素福是一位曾受过专门培训的萨拉菲主义者。^②“博科圣地”的宗旨是宣扬伊斯兰主义,主张在尼日利亚实行伊斯兰教法,宣扬以伊斯兰神权国家取代世俗国家。在与尼日利亚政府的较量中,“博科圣地”逐渐由一个伊斯兰主义组织异变为恐怖组织,给尼日利亚和西非地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为非洲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博科圣地”打着伊斯兰旗号,从起初较为平和地宣扬伊斯兰主义,到最终背离伊斯兰教,异变为一个恐怖组织。

(一)“博科圣地”问题成因

关于“博科圣地”兴起的原因,学界主要从国家治理、身份认同等角度予以解释。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合法性在于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安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就业机会和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司法体系等。一旦国家无法履行这些职责,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长此以往,一些生活无着落、挫败感严重的民众就会铤而走险,寻求极端路径。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被边缘化群体面对自身的贫困、失业、社会地位低下以及精英阶层腐败等社会现实时,要么通过强化宗教认同等身份认同来寻求精神慰藉,要么被包括宗教极端势力在内各种势力操纵利用,成为攻击政府的工具。^③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等宗教极端组织的出现,既是政府治理不力导致民众反抗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北部保守宗教环境的产物。

第一,民生问题突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尼日利亚经济过度依赖石油出口,成为典型的“食利国家”,腐败问题尤其突出。^④单一的石油经济发展导致农村、农业受到忽视,大部分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2010年尼日利亚贫困率达69%;西北、

^① “博科”(Boko)是豪萨语,从英文单词book(书)演变而来,引申为西方教育;阿拉伯语Haram意为“非法之物”、“被禁止之物”。Boko Haram合起来就是“禁止西方教育”。

^② “萨拉菲”系阿拉伯文单词salafi的音译,指严格遵守《古兰经》和“圣训”传统、效仿先知穆罕默德前三代弟子言行的穆斯林。萨拉菲派基本上都是伊斯兰主义者。

^③ Benjamin Maiangwa et al., “Baptism by Fire: Boko Haram and the Reign of Terror in Nigeria,” *Africa Today*, Vol. 59, No. 2, Winter 2012, pp. 42-44.

^④ Toyin Falola and Matthew M. Heaton, *A History of Nige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83-184.

东北地区尤为突出,分别高达 77.7% 和 76.3%。^①“博科圣地”之所以在尼日利亚东北地区兴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展问题在当地长期不被重视。^②在石油财富的支撑下,尼日利亚迎来了城市化浪潮,大量农村青少年涌入城市谋生。面对就业岗位稀缺的现实,不少人因根本找不到工作而流落街头,甚至沦为乞丐。一些伊斯兰组织、极端组织、犯罪团伙向他们提供食宿和零工,将失业青年招募入伙。20 世纪 80 年代初宣扬革新伊斯兰教、抵制西方消费文化的“诅咒者运动”虽得不到主流穆斯林群体的支持,但在城市生活无着的青年群体中间很有号召力。“博科圣地”的成员不仅包括城市无业青年,还有许多伊斯兰学校的学生、^③大学在校生和失业的毕业生。“博科圣地”兴建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招收尼日利亚贫困家庭子弟,就连邻国尼日尔、乍得的一些家庭也将孩子送来读书。^④贫穷、落后、被边缘化以及腐败、贫富悬殊、社会两极分化等问题往往成为当代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⑤,这些因素也是“博科圣地”兴起的重要原因。

第二,南北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尼日利亚北方穆斯林与南方基督徒之间的民族、宗教矛盾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差距,成为双方不时爆发冲突的导火索。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穆斯林和基督徒围绕国家世俗性、伊斯兰教法等问题展开激辩,甚至升级为暴力流血事件。尼日利亚北方地域辽阔,穆斯林人口众多,长期居于国家权力中心,加之北方 12 州不同程度地实行伊斯兰教法,南部基督徒承受较大压力。南部主要是基督徒聚居区,但基督徒在当地难以独当一面。在西南部约鲁巴人聚居地,穆斯林和基督徒数量相当。在东南部伊博族聚居地,基督教虽占主导地位,但伊博人在政治上长期被边缘化。由此看来,南部基督徒对北部穆斯林企图将整个尼日利亚伊斯兰化并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的担忧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博科圣地”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但该组织却利用尼日利亚南北地区差距,特别是穆斯林同基督徒的矛盾大作文章。南方不少民众认为,“博科圣地”出现在北部,是北方的问题,几乎不会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不少政府高官和政治家也持类似的观点^⑥,

^①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Nigeria Poverty Profile 2010 Report,” *ReliefWeb*, February 13, 2012, p. 4,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b410c26c2921c18a6839baebc9b1428fa98fa36a.pdf>, 登录时间:2018 年 4 月 8 日。

^② John Campbell, “U. S. Policy to Counter Nigeria’s Boko Haram,”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 70, November 2014, p. 6, <https://www.cfr.org/report/us-policy-counter-nigerias-boko-haram>, 登录时间:2018 年 5 月 30 日。

^③ William W. Hansen *et al.*, “Poverty and Economic Deprivation Theory Street Children, Qur’anic Schools/Almajirai and the Dispossessed as a Source of Recruitment for Boko Haram and other Religious, Political and Criminal Groups in Northern Nigeria,”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10, No. 5, October 2016, pp. 83–84.

^④ 吴传华:《“博科哈拉姆”:尼日利亚的塔利班》,载《世界知识》2011 年 18 期,第 43 页。

^⑤ 叶小文:《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载《人民日报》2016 年 1 月 12 日,第 3 版。

^⑥ Virginia Comolli, *Boko Haram: Nigeria’s Islamist Insurgency*, p. 24

忽视了“博科圣地”对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造成的挑战。

第三,国家治理脆弱。辉煌的历史和尼日利亚独立后北方穆斯林长期掌权的现实,使得北方人头脑中出现了国家领导权应由北方穆斯林执掌的思维定式。伊斯兰主义者甚至宣称“北方人注定是尼日利亚的领导者”^①。经过一系列政变、战乱、协商和妥协,穆斯林和基督徒“轮流坐庄”成为双方之间不成文的政治惯例。得益于这一惯例,尼日利亚自1999年实现还政于民以来,政局保持了基本稳定。2010年5月,北方穆斯林总统亚拉杜瓦任期内病故后出现了权力真空,引发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在国民大会的介入下,尼日利亚基督徒副总统乔纳森继任总统。北方穆斯林认为,亚拉杜瓦任期未满即病故,下届总统理应出自穆斯林。但乔纳森继任总统后,利用政治优势最终在2011年大选中获胜,引发北方穆斯林强烈不满,一些州爆发大规模骚乱事件。伊斯兰极端分子大肆渲染、夸大并利用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矛盾,借总统选举煽风点火,骗取穆斯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第四,境外宗教极端势力渗透。历史上,尼日利亚北部豪萨城邦曾是穿越撒哈拉沙漠贸易、伊斯兰教传播和伊斯兰学术的中心。进入现代以来,这种特殊的地缘环境却为境外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渗透提供了便利。马里、尼日尔、乍得等尼日利亚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民生和腐败问题突出,近年来伊斯兰势力出现上升趋势。实际上,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萨赫勒地带的蔓延不无关系。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组织“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在遭到阿尔及利亚政府军的追剿后退居南部沙漠地区,深入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和乍得境内活动,除袭击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队外,还绑架人质,贩卖人口,走私香烟、燃料和武器以获得资金来源。^②2003年9月11日,“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发表声明,宣布效忠“基地”组织,并于3年后与“基地”组织正式结盟,易名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此后,该组织不断扩充力量,大量吸收本土恐怖分子,其成员遂成为“基地”组织在西非、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主力军。

“博科圣地”的持续坐大与周边极端势力的渗透和相互勾连密切相关。2012年1月卡诺爆炸案后,联合国报告指出,“博科圣地”不少成员来自乍得。时任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涉案的200多名嫌疑犯中有160多人来自乍得。^③同月,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外长在毛里塔尼亚首

^① Ukiwo Ukoha, “Politics, Ethno-Religious Conflict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Nigeri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1, No. 1, 2003, p. 135.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slamist Terrorism in the Sahel: Fact or Fiction?,” *Africa Report*, No. 92, March 31, 2005, pp. 18-20.

^③ 范基荣、张建波:《尼日利亚宣布对“博科圣地”开战》,人民网,2012年1月29日, <http://world.people.com.cn/GB/16962146.html>, 登录时间:2018年4月10日。

都努瓦克肖特出席会议期间指出,“博科圣地”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存在联系,各国就采取行动共同打击极端组织达成共识。这表明,“博科圣地”的溢出效应已对包括西非和北非地区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

(二) “博科圣地”的异变

从 2002 年成立至今,“博科圣地”经历了从伊斯兰主义组织向恐怖组织的转变。从时间上看,2009 年是这一转变的分界点。

伊斯兰主义在尼日利亚并不新鲜,“诅咒者运动”与“博科圣地”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起初,“博科圣地”并没有走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政府的道路。该组织原头目穆罕默德·优素福认为非伊斯兰国家都是不合法的,强烈谴责加入现政府的穆斯林并要求他们退出世俗政府。“博科圣地”反对道德败坏和腐化堕落,重新确立伊斯兰文化认同和价值规范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其主张大多脱离现实和违背客观规律。该组织不仅反对西方教育、文化和现代科学,还反对穆斯林参加投票选举。

2009 年 7 月 26 日,“博科圣地”部分成员在包奇州首府包奇市要求当地警察局批准组织大型集会以宣扬伊斯兰主义遭拒后,断然向警方开枪,流血冲突很快蔓延到博尔诺州、约贝州及卡诺州。28 日,时任尼日利亚总统亚拉杜瓦颁布总统令,要求国家安全机构严厉打击北部宗教极端组织。30 日,尼日利亚政府发表声明称,上述四州的骚乱已基本平息,政府军全面包围了“博科圣地”头目优素福在迈杜古里的住所。2009 年骚乱造成 800 多人死亡,其中多数为“博科圣地”成员,优素福在被俘后被当局处死。^① 尽管“博科圣地”领导层遭受重创,但其成员仍在松散的领导下继续活动,并在迈杜古里、阿布贾等地制造了多起恐怖事件。

“博科圣地”主要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实施恐袭。首先,大选前后是包括“博科圣地”在内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最为活跃的时段。2011 年大选期间,“博科圣地”在卡杜纳、阿布贾及迈杜古里至少制造了 5 起爆炸袭击事件。^② 5 月 29 日乔纳森总统就职典礼日,“博科圣地”在首都阿布贾等地策划了一系列爆炸事件。2015 年伊始,当乔纳森宣布谋求连任时,“博科圣地”又在北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屠城”事件。其次,“博科圣地”选择传统宗教节日频繁制造恐袭。2011 年 11 月穆斯林宰牲节前夕,“博科圣地”在迈杜古里、约贝州首府达马图鲁和波蒂斯库鲁发动系列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教堂、清真寺、银行、警察局和兵营等,至少造成 150 人死亡。^③ 同年圣诞节,“博科圣地”又对

^① David Cook, “Boko Haram: A Prognosis,” *The James A.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of Rice University*, December 2011, pp. 10-11.

^② *Ibid.*, p. 17.

^③ Mohammed Aly Sergie and Toni Johnson, “Boko Haram,”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5, 2015,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boko-haram>, 登录时间:2018 年 6 月 10 日。

多座教堂发动袭击。“博科圣地”选择重要时间节点发动恐怖袭击,往往事前精准策划和组织,以求实现恐怖效应的最大化。

第二,根据力量对比选择袭击目标。“博科圣地”的袭击目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硬目标”,如警察局、监狱、兵营等军事设施以及安全防护较高的政府机构;另一类是“软目标”,包括教堂、清真寺、学校、汽车站、市场、平民、基督徒、外国人等。然而,“博科圣地”对袭击目标的选择往往不作严格区分,主要根据当时自身实力发动恐袭。2010年,“博科圣地”在包奇州策划了一起越狱事件,700多名囚犯得以逃脱。^①2011年8月26日,联合国驻尼日利亚机构大楼遭遇自杀性袭击事件,造成23人死亡、116人受伤。^②2012年1月,“博科圣地”在北方最大城市卡诺制造了数起炸弹袭击事件,以报复当地政府拒绝释放其一名成员,导致近19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警察和狱警。^③“博科圣地”经常针对女学生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等“软目标”发动袭击。2014年4月,“博科圣地”武装分子劫持了博尔诺州奇布克镇一所中学的276名女学生,此后虽然其中的57人侥幸逃脱,但仍有219人下落不明。^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指出,“博科圣地”还大量招募童子军,2016年约有2,000名儿童被“博科圣地”强征入伍。^⑤此外,汽车站、市场、宗教场所以及偏远的学校、村庄等“软目标”都是“博科圣地”的袭击对象。频繁发动针对“软目标”的袭击,也是恐怖组织实力下降的表现。^⑥

第三,“博科圣地”的危害程度不亚于“伊斯兰国”组织。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相比,“博科圣地”的残忍性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2015年恐怖主义指数》,2014年“博科圣地”制造的恐袭共造成6,644人死亡,较2013年激增317%,高于同年“伊斯兰国”组织恐袭致死人数(6,073人),成为全球最具危害性的恐怖组织之一。“伊斯兰国”组织恐袭致死人员中44%是平民,这一比例在“博科圣地”袭击事件中高达77%。^⑦2015年新年伊始,“博科圣地”在博尔诺州一周之内屠杀了2,000

① Sani Muh'd Sani, "Nigeria: Attack on Bauchi Prison — Boko Haram Frees 721 Inmates," *Leadership*, September 8, 2010.

② 《联合国公布在驻尼日利亚机构大楼爆炸案中遇难者名单》,人民网,2011年9月16日, <http://world.people.com.cn/GB/57507/15671826.html>, 登录时间:2018年5月30日。

③ "Boko Haram,"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Online*,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Boko-Haram>, 登录时间:2018年6月10日。

④ 徐晓蕾:《这个组织比“伊斯兰国”杀人更多》,新华网,2015年11月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1/21/c_128452744.htm, 登录时间:2018年5月30日。

⑤ "Boko Haram — 2,000 Children Recruited Used As Child Soldiers — Unicef," *Vanguard*, February 21, 2017, <https://www.vanguardngr.com/2017/02/boko-haram-2000-children-recruited-used-child-soldiers-unicef/>, 登录时间:2018年6月10日。

⑥ 朱素梅:《恐怖主义加强“软目标”袭击现象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4期,第37-38页。

⑦ 徐晓蕾:《这个组织比“伊斯兰国”杀人更多》。

人,并在占领巴加市后进行了大规模屠城行动,3,000 余座建筑被夷为平地。^①“博科圣地”的罪行充分暴露了该组织反人类、反社会和反宗教的本质。

第四,与境外恐怖组织沆瀣一气。“博科圣地”兴起初期曾效仿塔利班,被称为“尼日利亚塔利班”,后又与“基地”组织相互勾连。2015 年 3 月,“博科圣地”头目阿布巴卡尔·谢考^②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将组织更名为“伊斯兰国西非省”。一方面,“博科圣地”的效忠有利于“伊斯兰国”组织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张至西非地区,同时也可借用“伊斯兰国”组织的影响力吸引更多极端分子加入“博科圣地”;另一方面,鉴于“伊斯兰国”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打击对象,谋求借助这一组织“出头”的“博科圣地”可能比先前更加受到国际力量的关注和军事打击。^③从这个意义上讲,尼日利亚打击“博科圣地”更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三、尼日利亚应对“博科圣地”的策略选择

对尼日利亚而言,伊斯兰极端势力虽不是新问题,但联邦政府特别是乔纳森政府的应对措施仍显得经验不足。除传统应对措施外,尼日利亚周边邻国和国际社会的态度是决定该国打击“博科圣地”成效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国际社会转变了对尼政府反恐的态度,这为该国政府寻求国际反恐合作提供了可能。

(一) 乔纳森政府的应对

乔纳森是在尼日利亚前总统亚拉杜瓦任内病故后,由副总统继任总统的,并在 2011 年大选中获得连任。大选期间,尼日利亚国内民族宗教矛盾被人为放大,并被“博科圣地”加以利用,鼓吹穆斯林反对基督徒担任总统,该组织在大选期间频繁制造恐袭事件进行施压。身为基督徒的乔纳森面临的压力陡然上升,其连任后出台多项措施来打击国内极端势力。

第一,实行紧急状态。2011 年圣诞节期间,“博科圣地”在北部数州制造了一系列爆炸袭击事件。几天后,乔纳森宣布受袭的 4 个州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关闭其边境。2013 年 4 月,“博科圣地”宣布对博尔诺州的多起重大袭击事件负责,乔纳森随即宣布北部博尔诺州、约贝州和阿达马瓦州进入紧急状态,并要求军方增派兵力进驻当地维护社会秩序。后续事态发展表明,紧急状态的实施虽未能有效遏

^① 《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北部“屠城”已杀两千余人》,人民网,2015 年 1 月 10 日, <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5/0110/c1011-26360424.html>, 登录时间:2018 年 5 月 20 日。

^② 穆罕默德·优素福 2009 年死后“博科圣地”内部爆发了争夺领导权的血腥内斗,最后阿布巴卡尔·谢考胜出,成为新的头目。

^③ 徐超:《“博科圣地”宣布效忠 IS:不论荣辱 听从指挥》,新华网,2015 年 3 月 9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09/c_127557331.htm, 登录时间:2018 年 5 月 20 日。

制“博科圣地”在当地的暴恐行动,但有效遏制了恐怖主义势力向北部其他州和南部扩散。

第二,开展军事清剿。2012年伊始,尼日利亚副总统桑博召集北部19个州州长举行会议,宣布对“博科圣地”进行军事打击,并重新任命国家警察总监,加强警察系统改革,增强防范恐怖袭击的能力。同年9月,联合特遣部队、国家安全和警察在卡诺州、阿达马瓦州和约贝州共同实施了针对“博科圣地”的“恢复秩序行动”,对恐怖分子进行清剿,取得一定成效。此后,军方一直保持着对“博科圣地”的清剿行动。但是,2014年“博科圣地”劫持200多女学生后,军方虽大兵压境,却不敢草率行事。人质危机使得民众对军方的不满和失望与日俱增。客观地讲,尼日利亚军事实力在西非是最强的,其在非洲维和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国内反恐方面却表现平平。

第三,寻求欧美支持。人质危机使得尼日利亚政府不得不请求外部施援。由于历史原因,尼日利亚周边邻国均为法语国家。无奈之余,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只得请求法国出面召开安全峰会。出于保护在非利益并向外界展示在西非的传统影响力,法国欣然同意。2014年5月,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邀请尼日利亚及其邻国元首,以及英国、美国等国和联合国代表赴巴黎参加尼日利亚安全问题峰会。此次峰会的主要成果包括:提高情报共享、建立预警和边境控制、在危险地区建立安全—防卫机制、在乍得湖周边加强军事存在等。巴黎峰会开启了西非联合反恐的序幕。但奥朗德表示法国不会部署地面部队,表明法国只扮演协调者角色,解决“博科圣地”问题仍需要依靠尼日利亚及其邻国的共同努力。美、英也只派遣了军事专家和情报专家,美国还以尼军方存在违反人权的行为为由拒绝向尼出售武器,甚至不允许盟国以色列向尼出口同款武器,导致美尼关系一度不睦。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只是有限参与尼日利亚政府的反恐行动。

(二) 布哈里政府的举措

布哈里就任总统后,尼日利亚国内外对其期望颇高,希望本届政府能尽早清除恐怖主义,推进反腐进程,为国家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和条件。在反恐方面,布哈里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策略和措施。

第一,强硬表态,鼓舞士气。布哈里出身行伍,20世纪80年代初曾担任过军政权首脑,素以严厉、铁腕、信念坚定著称。2003年、2007年和2011年,布哈里曾先后三次竞选总统,但均告失败。2015年,布哈里再次参选,提出“我们终将战胜‘博科圣地’”的竞选口号,布哈里及其领导的全体进步大会党在多个场合高调表示要根除“博科圣地”。在同年5月29日的就职演说中,布哈里宣布要在2015年年底击败“博科圣地”。在2016年新年致辞中,布哈里再次强调把恐怖分子彻底

消灭的决心^①,旨在通过鼓舞士气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第二,前移反恐中心,织密反恐大网。在布哈里之前,尼日利亚政府的反恐指挥中心设在首都阿布贾。在交通、通讯等后勤尚不能得到完全保障的尼日利亚,将反恐指挥中心设在离主战场较远的阿布贾显然存在缺陷。尼民众经常抱怨政府反应迟缓,出师不利的军人也指责长官躲在安全处,让他们去前线充当炮灰。布哈里戎马一生,深谙排兵布阵之道,因此他在就职演讲中指示军方将军事指挥和控制中心前移至“博科圣地”的起源地迈杜古里。这一策略调整对于鼓舞士气、提升战斗力和反应速度、安抚东北地区民众恐慌情绪十分必要。

为进一步织密反恐大网,布哈里就职后首次出访即选择邻国尼日尔和乍得。在与两国元首的会晤中,布哈里重申尼日利亚政府彻底剿灭“博科圣地”的立场,并感谢两国收留尼难民。2015年6月初,尼日利亚与邻国国防总参谋长齐聚阿布贾,共商打击“博科圣地”之策。6月11日,布哈里主持召开了乍得湖盆地委员会领导人会议,会议决定组建多国联合部队,由尼日利亚军官任总指挥,总部设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各国部队计划于7月底部署到位。会议还决定投入资金改善受“博科圣地”影响而不断恶化的地区环境,发展当地经济。事实证明,这一举措有效地端掉了“博科圣地”的老巢。即便“博科圣地”退至北部森林地带,联军的日常训练和行动仍能对它形成很强的威慑力。此次地区合作反恐受到尼日利亚国内、次区域和全球的普遍好评。^②

第三,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为修补与尼日利亚的关系,西方国家在布哈里获胜后转变了对尼的态度。布哈里就职前,七国集团就曾邀请布哈里参会,主动向尼示好。布哈里上台后,美国决定派工作组赴阿布贾帮助尼政府反恐。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也表示将加大对尼反恐的支持力度,并决定向尼日利亚出售战斗机等先进武器。总的说来,西方国家对尼反恐的支援仍停留在提供武器装备、资金支持 and 情报援助的层面,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不大。

2015年6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第25届非盟峰会期间,布哈里应邀主持了“非盟和平与安全委员会会议”,并同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双边会晤,进一步落实此前达成的反恐协议。布哈里重申“博科圣地”已成为地区性问题,对尼日利亚及其邻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恐怖主义、局势动荡、贫穷、青年失业、欠发展等问题威胁着整个非洲大陆。他强调,打击“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和“伊斯兰马格里布

^① Emmanuel Aziken, Political Editor and Joseph Erunke, “New Year Message: I know Nigerians Are in Pains,” *Vanguard*, January, 2016, <http://www.vanguardngr.com/2016/01/new-year-message-i-know-nigerians-are-in-pains-buhari/>, 登录时间:2016年1月3日。

^② Joshua Olusegun Bolarinwa, “International Reactions and Actions on Militancy and Insurgency in Nigeria since 1999,” *Insight on Africa*, Vol. 10, No. 1, 2017, p. 110.

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环境,不仅需要当事国、地区组织开展合作,还需要非盟等政府间组织的支持。

四、尼日利亚政府反恐成效及前景

尼日利亚反恐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决定了打击“博科圣地”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尼日利亚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民生问题的解决。在具体的反恐措施中,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去极端化措施,对尼日利亚而言是一个新课题。

(一) 打击“博科圣地”的成效

2015年底,布哈里宣布他已实现竞选诺言,“博科圣地”已在技术层面被打败。这表明,尼政府的反恐策略取得了成效。

首先,“博科圣地”整体上失去了其宣称的“伊斯兰国西非省”的控制区域。2014年8月,“博科圣地”头目谢考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该组织当时占据了北部大片领土。随着多国联合部队的有效打击,“博科圣地”节节败退。尼日利亚军方还除掉了“博科圣地”领导层中的多位关键人物,总体上切断了其与“伊斯兰国”组织的联系。“博科圣地”发布视频的频率也较以往有所降低。^①

其次,尼日利亚东北重镇迈杜古里受大规模恐袭风险降低。迈杜古里是博尔诺州首府和最大城市,居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市内也有一定比例的基督徒居住。人口结构导致当地易爆发教派冲突,历史上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曾多次爆发冲突,“博科圣地”与多国部队在当地也曾爆发多次激战。迈杜古里及周边地区是“博科圣地”活动的重心,恢复当地社会稳定对反恐行动意义重大。

2016年以来,“博科圣地”袭击的频度和烈度大幅下降。《2017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因“博科圣地”恐怖袭击死亡人数较2015年下降了80%,2016年全球最严重的20起恐怖袭击中,只有一起是“博科圣地”发动的。^②但“博科圣地”的危险性仍不容忽视。2017年,“博科圣地”多采用以零星的“独狼”式袭击手段,袭击目标除普通民众外,还包括向东北三州运送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联合国车队,造成了大量救援物资损失。在尼日利亚军方的持续围剿下,“博科圣地”核心力量已收到重创,导致该组织开始利用女童进行自杀式袭击来扩大恐怖效

^① Jacob Zenn, “Boko Haram Is Not ‘Defeated’ but Buhari’s Strategy Is Working,” *African Arguments*, January 5, 2016, <http://africanarguments.org/2016/01/05/boko-haram-is-not-defeated-but-buharis-strategy-is-working/>, 登录时间:2016年1月6日。

^②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7*,”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November, 2017, pp. 4, 13, <http://visionofhumanity.org/app/uploads/2017/11/Global-Terrorism-Index-2017-Snapshot.pdf>, 登录时间:2018年6月13日。

应。2017 年 8 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 1~8 月,83 名儿童被“博科圣地”用作人体炸弹,其中 55 名是 15 岁以下的女童。^①

尼日利亚军方在反恐行动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实现和平并非易事,当前仍有 200 名遭“博科圣地”绑架的女学生下落不明,^②东北部重建任务艰巨,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与此同时,“博科圣地”成员不时改头换面,混迹于难民营中,伺机作乱。该组织还改变策略,转而对“软目标”发动袭击;化整为零,四处藏匿;多使用女性,特别是女童和携带婴儿的妇女从事自杀式袭击。尼政府和军方虽多次宣称击败“博科圣地”,但 2018 年以来该组织的恐袭活动出现了一定反弹,2 月下旬“博科圣地”袭击了东北部约贝州一所女子科技学院,导致 110 名女学生下落不明。^③ 布哈里总统宣布该起绑架案为“国家灾难”,要求军方加大打击“博科圣地”的力度。^④ 除军事打击外,尼日利亚政府也开始同“博科圣地”展开谈判,要求该组织尽早释放遭绑架的人质(特别是女学生)。据尼日利亚媒体 3 月 21 日报道,遭绑架的女孩已经获释,但是否所有的 110 名女生都已获释还不得而知。^⑤

(二) 应对“博科圣地”问题的前景

从长远看,要根除“博科圣地”等恐怖主义势力,尼日利亚政府和国际社会仍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合作。

一是继续保持军事打击力度。当前,“博科圣地”与军方大规模对抗的可能性较低,但该组织仍具有在局地制造恐袭的能力。随着“博科圣地”成员可能向边界地区流窜隐匿,多国联合部队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尼日利亚军方已决定继续加强在北部的驻军,对恐怖分子施加武力威慑。

二是着力解决社会突出问题。尼日利亚北部靠近萨赫勒地带自然条件差,发展缓慢,社会问题突出,“博科圣地”在此肆虐多年,破坏力惊人,导致当地生活环境进一步恶化。目前,尼日利亚东北部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和饥荒,数百万民众亟需国际社会的救援。加大资金投入,帮助难民渡过难关和重建家园,恢复经济和生态已成为尼日利亚政府的首要任务。尼政府已表示要解决乍得湖面临的生态环境

^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谴责博科圣地利用儿童制造自杀式爆炸》,中国驻尼日利亚使馆经商处网站,2017 年 8 月 23 日, <http://nigeri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708/20170802631923.shtml>, 登录时间:2018 年 3 月 15 日。

^② 2014 年 4 月 14 日,“博科圣地”绑架了 276 名女学生,后有 50 多人逃出;2016 年 10 月,该组织释放了 21 名学生;2017 年 5 月,该组织再次释放 82 名人质。据此推算,目前仍有 120 多名女生下落不明。

^③ 李凉:《尼日利亚安全形势持续恶化》,载《人民日报》2018 年 2 月 28 日,第 21 版。

^④ “Buhari Speaks on Abducted Dapchi Schoolgirls — Premium Times Nigeria,” *Premium Times Nigeria*, February 23, 2018, <https://www.premiumtimesng.com/news/headlines/259693-buhari-speaks-abducted-dapchi-schoolgirls.html>, 登录时间:2018 年 3 月 15 日。

^⑤ Abdulkareem Haruna, “Nigeria: Dapchi Schoolgirls Freed,” *allAfrica*, March 21, 2018,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803210196.html>, 登录时间:2018 年 6 月 10 日。

问题,同时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来改善民众赖以生存的水资源问题。

三是加强宗教去极端化工作力度。“博科圣地”利用伊斯兰教宣扬宗教极端思想,发展出一套兼具狂热性和暴力性的宗教话语,蛊惑并动员普通群众加入极端组织。宗教极端主义并不必然演变成恐怖主义,但是各种恐怖主义的背后大多有宗教极端主义作为思想支撑。^①从预防角度看,宗教去极端化工作的重要意义甚至要超过军事打击的意义。

四是加强地区和国际反恐合作。“博科圣地”从清真寺起家,由点到面,宣布“建国”^②,效忠“伊斯兰国”组织,凸显了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地区化与国际化并重的趋势。因此,尼日利亚打击“博科圣地”,在国内层面需要联邦政府的努力、南北地区和北部诸州之间开展协调合作,在地区层面需要尼与邻国西非共同体成员国以及非盟成员国之间开展务实合作,国际层面需要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和开展反恐合作。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博科圣地”的兴起与尼日利亚特殊的民族-宗教-地缘生态密不可分,它的异化则说明,民族宗教问题极易被极端势力所操纵,成为谋取个人或帮派利益的幌子,极具欺骗性。“博科圣地”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充分暴露了其反人类、反宗教的本来面目。尼日利亚的应对措施总体而言比较有效,“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但事实证明,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恐怖组织较普通恐怖组织更具欺骗性、蛊惑性、国际性和破坏力,打击此类恐怖组织的行动也更具长期性和复杂性。对国际社会而言,应对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任重而道远,对民族国家构建程度不高、社会分化严重、经济社会矛盾突出的尼日利亚来说更是如此。未来,尼日利亚应着力解决国家发展问题,构建和谐民族宗教关系,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来构筑抵御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的防线。

(责任编辑:章 远)

^① 叶小文:《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

^② 2014年8月24日,“博科圣地”头目谢考宣布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小镇果扎建立“哈里发伊斯兰国”。